



作者运用疏、识的形式，通过大量真实可靠的历史文献资料，对原著中涉及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的问题，尤其是歧异争议的热点和难点进行了说明

中国小说史略疏识

鲁迅◎著
张兵 聂付生◎疏识

中國小說史略疏識

鲁迅◎著
张兵 聂付生◎疏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小说史略疏识/鲁迅著;张兵,聂付生疏识.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
ISBN 978-7-309-08211-1

I. 中… II. ①鲁…②张…③聂… III. 鲁迅著作-小说史-文学研究-中国 IV. 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6138 号

中国小说史略疏识

鲁 迅 著 张 兵 聂付生 疏识
责任编辑/宋文涛 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1.5 字数 412 千
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211-1/I·624
定价: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一本书成就一门学科,奠定八十余年研究根基,这就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下称《史略》)的价值。迄今为止,我们的古代小说研究依然在这部名著的指引下前进。

然而,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历史条件(时代思潮、文献资料和学术认知等),它也有着许多局限,甚至是明显的失误,这也是当今学界公认的事实。其因也皆囿于作者是一代伟人,且学术的发展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受制于伟人光环的束缚而较少有越雷池的勇气之故。近年来,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发展很快(现代小说的研究相对显得薄弱),这表现为:1. 大量古代小说文献的出版(不仅是国内的,而且珍藏于海外的),几乎已囊括了我们的全部“家产”;2. 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仅据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几所大学报考小说研究的博士生来说,呈历年递增之趋势,老、中、青三代雄心勃勃,成果累累;3. 研究著作不断涌现,研究领域逐步拓展,较高较新学术质量的著作层出不穷;4. 中国社科院建立“古代小说研究中心”,创办“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专刊,还有“明清小说”、“中国古代小说”网站,连同原来的《明清小说研究》等专业刊物,正为它的深入发展推波助澜;5. 研究者来自世界各地,非常团结和专心致志,他们在出版《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的基础上,拟编纂影印散见于海外各家图书馆的珍本小说等等。而《史略》的缺陷也日益显露,并且受到学者的质疑,跟不上蓬勃发展的学术形势,这一点也是极为明显的。

我们在多年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和教学的实践中,对《史略》有一定的钻研和新解。我们既要尊重伟人,又要跳出伟人的光环,这关键就是实事求是,须以事实说话。我们进行这项课题研究,旨在丰富或充实鲁迅的观点和材料。题作《疏识》,是想在对文本作疏释的基础上,针对《史略》中提出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的或重大的问题,试着申述我们个人的观点。

由此,我们拟将全书为三个部分,即【原文】、【疏】、【识】。为了有利于准确地理解《史略》的基本思想,我们还“附录”了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其中“原文”以人民文学出版社本为准,并对文本重新作了分段和标点。

“疏”是本书的主要部分,我们围绕着鲁迅的观点和论述,查阅了几百部相关的古籍文献,并且参阅了学者们已经出版的上百部论著和上千篇相关的论文,书后提供的《主要参考书目》仅是部分内容。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力求资料准确、完整和能说明问题。针对《史略》,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努力。

第一,对《史略》中的观点和作者论证的材料予以解释和补充。鲁迅文善以简练著称,其论文亦如此,因此,《史略》中在很多地方的论述只是点到为止,缺乏深入而细致的阐述,这给后人、尤其是文史爱好者带来阅读上的障碍,所以,有必要对这些论述加以深化或补正。如在论述神话的传播时,鲁迅说:“盖当歌颂记叙之际,每不免有所粉饰,失其本来,是以神话虽托诗歌以光大,以存留。然亦因之而改易,而销歇也。”(《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7页)这诚然精辟,却不易理解,我们即作如下的疏解,云:

中国神话从口耳相传到形诸笔墨,始于《诗经》,其中《玄鸟》和《生民》两篇叙写契和后稷诞生的神异,成为契和后稷诞生神话最早的文学纪录。屈原是神话集大成者,其《天文》从天地开辟到夏、商、周的人事兴亡,无所不包,第一次把分散的古老神话传说系统化、完整化,把各地的神话素材编入其作品之中,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天问》云云,据旧说以难新说也。”(《天问疏证》)其实,《九歌》、《离骚》、《九章》、《招魂》等作品出现的神话都是“难新说”的“旧说”。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神话“托诗歌以光大、以存留”的原因。当然,屈原在书写这些神话的过程之中,也绝不是纯客观的记叙,据王逸《楚辞章句》说,原始的《九歌》相当简陋鄙野,“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除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屈原“更定其词,去其泰甚”(朱熹《楚辞集注》卷七),将神祇人格化。如《山鬼》本是传说中的“山魈”,人面猴身,乃一足之夔变化而成,屈原却把它描绘成一个美丽多情的山神,赋予了只有文人才具有的雅化美质。加上中国古来就有重史的传统,殷周两代,王室已有专职记史的史官,降至春秋战国,诸侯国都相继设立此职,为美化和树立其祖先的权势和威望,往往将神话历史化。孔子言必称尧舜,曲解神话以为己用。如把《尸子》“黄帝四面”的描述解释成黄帝派遣四人分治四方。从某种程度上说,不管是诗人还是史官,他们的作为都限制或削弱了神话的流传,即使他们借诗的形式把口耳相传的神话传承下来,也与原生态神话相去甚远。所以,鲁迅说,神话“亦因之

(诗歌)而改变、而销歇也”。

对中国神话的起源、演变以及在中国文学中的运用等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以期有助于对神话特点的了解。

第二,对《史略》中论述问题时某些语焉不详之处,我们根据目前的学术发展尽量予以清楚的说明。学术研究,重在观点明确,切忌含糊其辞,有时即使不能对所述的问题有肯定的回答,似乎也应该把疑惑之处揭示出来。《史略》中确有一些语焉不详的地方,这极易给读者造成误解。如在论述《西游补》里孙悟空“行行情”时,鲁迅只说:“其云鲮鱼精,云青青世界,云小月王者,即皆谓情矣。”(《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八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48页)情,有不同层次的。这样泛泛而谈,极易给人以男女之情的错觉。其实,此处的“情”,是极富哲理的,是看破世情之后的顿悟。对此,著名的文史专家苏兴先生有详细的论述。因此,我们就以苏先生的文章片段作为“鲁史”的有益补充,以求尽量把问题说清楚、讲明白,不误读者。

第三,对《史略》中的某些不全面或不正确的观点,予以修正。由于时代的原因,鲁迅在撰写《史略》时,有很多材料没有看到,因此,书中提出的某些观点和论述,在今天看来是片面的,甚至是不正确的。这一点,我们似也不必为贤哲讳言。对此,我们一般采用具体的、确凿的、可靠的历史资料来做说明,以修正鲁迅的看法;并且尽量引用后来一些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以作佐证,在弄清问题来龙去脉的基础上,期待着引导学术的不断前进。如《史略》中认为世德堂刊本《西游记》“出于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34页)。鲁迅此说一出,在学术界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议。胡适云:杨本“是一个妄人硬删吴承恩本编成的节本,决不是吴本以前的古本”,而“鲁迅先生误信此书为吴本之前的祖本”(《跋〈四游记〉本的〈西游记传〉》)。郑振铎认为胡适所论杨本是吴本的节本这一见解正确,并补充了有关例证,同时指出:“鲁迅先生未见《永乐大典》本,但他相信《四游记》里的那部齐云杨致和编的《新刻唐三藏西游全传》为吴氏书的‘祖本’。如果他的话可信,则在古本与吴氏书之间是别有一部杨氏书介于其间的了。”具体分析后又断言:“鲁迅先生所说的吴氏书有‘祖本’的话是可靠的。不过吴氏所本的,未必是杨致和的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而当是《永乐大典》本。”(《西游记的演化》,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55页)《永乐大典》第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卷“送”字韵引《西游记》,所引“魏征梦斩泾河龙”

“文与吴承恩《西游记》不同，而语意大似话本。引书标题作《西游记》，则明初确有《西游记》一书，远在吴书之前也”（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88页）。据此言，郑振铎的推断有一定合理性。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亦云：“或者吴承恩的《西游记》也许不无所本，不过周树人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推论吴氏之作是本于东、西、南、北《四游记》中杨志和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但杨志和的年代未详，与吴承恩的前后难以确定，恐怕或许是杨氏为要编《四游记》才把吴承恩本节略的。”（《中国文学概论》，隋树森译，重庆出版社，1982年，第155页）由此，鲁迅遂借《中国小说史略》在日本出版的机会更正曰：

郑振铎教授又证明了《四游记》中的《西游记》是吴承恩《西游记》的摘录，而并非祖本，这是可以订正拙著第十六篇的所说的，那精确的论文，就收录在《病楼集》里。（《〈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参看《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自鲁迅修正观点后，把杨本和朱鼎臣本《释厄传》看成是百回本《西游记》的删节本。当时诸家观点基本一致。对郑氏提出的《永乐大典》本是吴本之祖本的说法亦无异议。1962年，旅澳学者柳存仁率先质疑，对杨本、朱本与吴本之间的关系提出新看法。他认为杨本删削朱本而来，并提出吴承恩综合杨、朱两本成就百回本《西游记》的新见解云：“不只是《西游记传》删割《释厄传》而袭取其大部分的文字，百回本《西游》对《释厄传》及《西游记传》实际上也都有所承袭”，“百回本《西游记》必定是《释厄传》和《西游记传》以后的产物”，即朱本最早，杨本系删削朱本而成，吴承恩则借鉴了朱、杨二本（《西游记的明刻本》，《新亚学报》第5卷第2期）。今人李时人对吴本、朱本和杨本之关系重新考辨，得出结论，云：杨本、朱本都不可能是祖本，而是删节本。朱本前七卷依据了世本以前流传的吴氏书，从第七卷末尾开始至结束则抄自杨本（李时人：《吴本、杨本、朱本〈西游记〉关系考辨》，载《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我们在“疏”中把这些不同观点罗列于此，并且略加说明。读者无疑可以从中获得智慧的启迪，至少也能给《史略》中的观点提供一些可以比较的参照。

当然，如果我们有充分的材料能够证明《史略》中的某些不完善之处，也会充满自信地提出我们的观点来。如《史略》认为唐传奇的繁荣与温卷关系很密切的观点，在我们看来是很有商榷之空间的。尽管此一说法有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汪辟疆（《唐代小说序》）、冯沅君（《唐传奇作者身

份的估计》，《文讯》1948年第9卷第4期）、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商务印书馆，1952年）等名家支持，但通观有唐一代史料，只有赵彦卫所言《幽怪录》、《传奇》是以传奇投献考官而中进士的例子。这样的孤证很难说明温卷与传奇繁荣之间的很密切的关系。我们认为，唐传奇的繁荣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还是得力于唐代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好文尚气的唐代士风。至于投献考官，只是起了一种催化的作用而已，不宜夸大，除非有非常丰富的史料能够证明之。而至少到目前为止，似乎尚未看到更多的历史资料可以用来说服我们。

“识”则是对《史略》中全“篇”的评论，意图在阐述我们的学术见解和学术思想，以达“与时俱进”的目的，传述比较前沿的研究信息，从而引人思考，期望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以此为出发点，我们用简练的文字对《史略》涉及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些基本的或重要的问题略作点评，在充分肯定鲁迅的思想和观点，同时指出其片面和错误的地方，再提出我们的看法。如，对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我们首先肯定他的贡献，云：

“小说，史之余”，这一传统观念的形成，与史家对小说之著录及论述密不可分。《汉书·艺文志》明言小说为稗官所为，即已拉开史与小说联姻的序幕，正如如淳所说：“王者欲知闾巷民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使稗官所为与史官所修具有相同的社会功能。“咸称良史”的干宝以“古今怪异非常之事”而成《搜神记》，却以“发明神道之不诬”现实追求相标榜。颇具小说性者如《拾遗记》、《幽明录》、《汉武洞冥记》等在《隋书》中却混列于史部，刘知幾把小说细化为十类，胡应麟、纪昀的“寓劝戒、广见闻”阐述，以至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创作者及其小说理论家都以史的眼光观照被人贱视的通俗小说等等，都在说明“史”在小说这一文体形成过程中的渊源和作用。鲁迅以此切入中国小说史，正抓住了中国小说演变、发展的关键。鲁迅要言不烦，既清晰阐明中国小说观念的形成和特点，又为中国小说史作了一个简洁明了的梳理，其间的发展轨迹清晰可循。

再指出不足，同时阐明我们的观点，云：

既然是中国小说观念嬗变和历史发展的宏观把握，我们认为，鲁迅所论还有很多欠缺。首先，刘知幾《史通》是史家视野下小说观念演变的一篇重要文献，鲁迅付之缺如，有失偏颇。毫不夸张地说，刘知幾在《史通》中首次对小说

这一概念予以比较系统的总结。在小说发展史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刘知幾把小说细化为偏纪、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类,并分别予以阐述,即是前此史家对小说的性质、功能及其文化内涵等所作的系统分析,其中对“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的论述,则是对小说文体性质精心体察的结果。明之胡应麟除志怪、传奇两类颇有创意外,其他类别和清之纪昀的三类分法及其论述基本源于《史通》,却没有超出其说。鲁迅有此疏漏,对理解或阐述中国小说史,特别是中国小说观念的演变是不完整的。

其次,小说著录及论述并不限史家,很多序跋和野史、笔记都大量涉及,有些较史家的著录更为详细,论述更趋合理,尤其是通俗小说更是如此。《辍耕录》、《东京梦华录》、《醉翁谈录》等著录很多宋元话本,这是大家皆知的事。徐渭《吕布宅·小序》谓:“始村瞎子习极俚小说,本《三国志》,与今《水浒传》一辙,为弹唱词话耳。”(徐渭:《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785页)认为《三国》与《水浒》,都来源于弹唱词话。清俞樾曾在《茶香室丛钞》、《小浮梅闲话》等笔记中,考评《水浒传》、《英烈传》等数十部通俗小说,苏州吴县藏书家潘祖荫,滂喜斋中藏有抄本《儒林外史》,他还经常与近邻俞樾谈论院本传奇、平话小说;扬州仪征藏书家吴引孙,对通俗小说亦情有独钟,其测海楼中度藏着《绘图三国演义》、《绘图荡寇志》、《绣像绿牡丹》等通俗小说八十二种。等等如此,都表明史家之外的著录及其论述是中国小说史非常珍贵的资料。即使鲁迅已经提到的史家,也有提及通俗小说者,如胡应麟将《水浒》与《三国》都归入“今世传街谈巷语有所谓演义者”(《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即是一例。然鲁迅亦少提及,不知何故。

其他的篇章亦大致如此。这部分的内容,旨在对《史略》这部小说史研究的经典名著有一个既系统、又实事求是的看法,力求让它与时俱进,以发挥更大的学术作用。

为了读者翻检的方便,我们还附录了本书涉及的“主要参考书目”。其中,凡鲁迅的作品,皆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的文字为准。这是需要说明的。

八十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不但是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奠基之石和开山之作,而且是树立在这一领域的一座历史丰碑。今天我们对《中国小说史略》的研究,是这门学科深入发展的需要,也是学界同人的殷切期盼。不自

量力的我们,毅然挑起了这一重担,实乃出于责任使然。说实话,这一份劳作的效果如何,是当下我们最为关切的事。龚自珍有诗云:“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们愿做培育《史略》这朵美丽之花的“春泥”,使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更上层楼。

张兵 聂付生

题 记

回忆讲小说史时,距今已垂十载,即印此梗概,亦已在七年之前矣^[1]。尔后研治之风,颇益盛大,显幽烛隐,时亦有闻^[2]。如盐谷节山教授之发见元刊全相平话残本及“三言”,并加考索,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3];即中国尝有论者,谓当有以朝代为分之小说史,亦殆非肤泛之论也^[4]。此种要略,早成陈言,惟缘别无新书,遂使尚有读者,复将重印,义当更张,而流徙以来,斯业久废,昔之所作,已如云烟,故仅能于第十四、十五及二十一篇,稍施改订,余则以别无新意,大率仍为旧文。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讫黯然,诚望杰构于来哲也。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之夜,鲁迅记。

【疏】

[1] 鲁迅于1920年12月24日起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第二年1月12日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该课。他的讲稿《小说史大略》就是他讲课的讲义稿。始以油印本在学生中流传,印本“每面十行,每行约二十三、四字,骑缝上都写‘小说史’三字,中下部写页码,最下部写‘周树人’三字”(单演义《关于最早油印本〈小说史大略〉讲义的说明》)。讲义分十七篇,即:

史家对于小说之论录

神话与传说

汉艺文志所录小说

今所见汉小说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下)

世说新语与其前后

唐传奇体传记(上)

唐传奇体传记(下)

宋人之话本

元明传来之历史演义

明之历史的神异小说

明之人情小说

清之人情小说

清之侠义小说与公案

清之狭邪小说

清之谴责小说

鲁迅以此为基础,补充资料,校勘辨正,出版了铅印本《中国小说史大略》,“四号字横排,竹纸,单面印刷,中间折缝,有目录”(杨燕丽:《〈中国小说史略〉的生成与流变》,《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9期),内容增加至二十六篇。1923年10月,鲁迅把《中国小说史大略》改名为《中国小说史略》,将上卷部分寄给孙伏园,“托其付印”,12月就由新潮社排印出来。《中国小说史略》下卷也在1924年6月问世(《鲁迅日记》)。从篇目的演变看,“由油印的讲义本十七篇,到铅印的讲义本二十六篇,到初版本上、下册的二十八篇,内容的增减变化,是非常大的。油印讲义本的第一篇《史家对小说之论录》,到铅印讲义本删去了,到初版本又修改增入;油印讲义本到铅印讲义本时,增加了《唐之传奇集及杂俎》、《宋之志怪及传奇文》、《宋元之拟话本》三篇,又将《元明传来之历史演义》改为《元明传来之讲史》两篇,将《明之历史的神异小说》改为《明之讲史》,增加《明之神魔小说》一篇,扩充为上、下两篇,到初版本时更增加《明之神魔小说》(中)一篇,《明之人情小说》一篇,扩充为上、下两篇,又增加《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清之讽刺小说》三篇,在《清之狭邪小说》前后各增《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与《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一篇。由此可知从油印讲义到初版本用力之勤劬的了”。(单演义:《关于最早油印本〈小说史大略〉讲义的说明》)1925年9月,《中国小说史略》合订本由北新书局再版。此后,《中国小说史略》多次印刷,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鲁迅也陆续收到来自各界的批评信件和文章,因此,鲁迅从1930年11月20日起,再次“开始修正《中国小说史略》”。25日“改定《中国小说史略》讫”,并写《题记》,代替原书的《再版附识》。修订后的《中国小说史略》于1931年9月仍由北新书局印行。

- [2] 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大概始于小说理论家王钟麒(天僊生),他的《中国历史小说史论》是正本清源的开山之作。该作首先倡导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并明确强调研究中国小说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文章说:“吾以为欲振兴吾国小说,不可不先知吾国小说之历史”,并概略地描述了中国小说的发展历史。兹引述如下:

自黄帝藏书小酉之山,是为小说之起点。此后数千年,作者代兴,其体亦屡变。晰而言之,则记事之体盛于唐。记事体者,为史家之支流,其源出于《穆天子传》、《汉武帝内传》、《张皇后外传》等书,至唐而后大盛。杂记之体兴于宋,宋人所著杂记小说,予生也晚,所及见者,已不下二百余种,其言皆错杂无伦序;其源出于《青史子》。于古有作者,则有若《十洲记》、《拾遗记》、《洞冥记》及晋之《搜神记》,皆宋人之滥觞也。……章回弹词之体行于明、清。章回体以施耐庵之《水浒传》为先声,弹词体以杨升庵之《廿一史弹词》为最古;数百年来,厥体大盛,以《红楼梦》、《天雨花》二书为代表。其余作者,无虑数百家,亦颇有名著云。(原文见1907年《月月小说》第1年第11号,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所论尽管粗疏,但却开创了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新局面。在其影响下,1920年6月,张静庐(1898—1969)撰写的《中国小说史大纲》完成,由泰东图书局(上海)出版,卷首有王无为、王靖等人序和作者自序。全书分五卷,卷目依次是:小说的定义与性质、小说的沿革、现代的小说思潮、小说的派别与种类和传奇与弹词略言。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小说史专著,比鲁迅的油印本还早半年时间。紧接其后的是郭希汾(1893—1984)译编著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国书局,1921)、庐隐(1898—1934)译著的《中国小说史略》(刊于1923年《晨报》附刊之《文学旬刊》三至十一号)、徐敬修(1898—1926)编的《说部常识》(大东书局,1925年)、范烟桥(1894—1967)著的《中国小说史》(苏州秋叶社,1927年)和胡怀琛著的《中国小说研究》(商务印书馆,1929年)等。这就是鲁迅在完成《题记》之前的中国小说史研究大致情况。

- [3] 盐谷温(1878—1962),字节山,日本汉学家。他的《关于明的小说“三言”》一文,介绍了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所刊全相平话五种,即《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三卷、《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

春秋后集》三卷、《新刊全相秦并六国平话》三卷、《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三卷、《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三卷(载 1924 年日本汉学杂志《斯文》第八编第六号)。

- [4] 论者,指郑振铎。本篇手稿原作:“郑振铎教授之谓当有以朝代为分之小说史,亦殆非肤泛之论也。”

序 言

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1]。

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然而有作者，三年前，偶当讲述此史，自虑不善言谈，听者或多不愜，则疏其大要，写印以赋同人；又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省其举例以成要略，至今用之。

然而终付排印者，写印已屡，任其事者实早劳矣，惟排字反较省，因以印也。

自编辑写印以来，四、五友人或假以书籍，或助为校勘，雅意勤勤，三年如一，呜呼，于此谢之^[2]！

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夜，鲁迅记于北京。

【疏】

- [1] 据前苏联汉学家艾德林、李福清等人考证，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最早的是19世纪80年代俄国著名学者柯尔施主编的《世界文学史》。该作出版于1880年，其中第一卷论述包括中国、埃及、印度等在内的东方文学，中国部分约有一百六十页的篇幅，并在同一年曾以《中国文学史纲要》的书名单行出版（《新民晚报》1980年8月18日）。1897年和1898年，日本接连出现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笹川种郎的《支那小说戏曲小史》、《支那历朝文学史》。其中笹川种郎的《支那小说戏曲小史》（1897年）是“最早的有关中国小说戏曲的分体史”（黄霖、顾越：《盐谷温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复旦学报》1999年第6期）。之后，英国学者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1901年）、德国学者葛鲁贝的《中国文学史》（1902年）相继出版。1919年，日本著名汉学家盐谷温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所论“多前人未到之境，筭路蓝缕，负担着开拓之功不少”（同上）。因为两书的书名相同，而且书中的有些观点确也相似，所以，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出版后，有些中国的学者，如顾颉刚先生等，曾经责难鲁迅此书有抄袭和剽窃盐

谷温氏著作之处,因而曾在学术界引起过一场不小的争论。其实,鲁迅自己也说过:“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1926年2月1日《语丝》第六十五期)这里的“盐谷氏的书”即指《中国小说史略》,但是在我们认真比较了两书以后,可以发现鲁迅在写作《中国小说史略》一书时,确曾从盐谷温氏的同名著作中得到过某些思想的启迪,然而他们两人对中国小说的许多重要历史现象和文学思想的想法是不同的,有的观点甚至是对立的。指责鲁迅抄袭甚至是剽窃盐谷温氏的看法不符合实际,是草率和主观的。章培恒曾有专文叙述。上引黄霖、顾越的文章也有说明,可参看。

而在中国,最早的文学史著作是林传甲由讲义编纂而成的《中国文学史》(1904年)。林传甲(1877—1922),号奎腾,侯官县(今福州市区)人。其《中国文学史》编于1904年,1910年由武林谋新室初版发行;与此同时,黄人(1866—1913)执教于东吴大学,他从1904年编撰的讲义《中国文学史》,随编随印,到1907年出全三十册,先在校内使用,后由上海国学扶轮社正式出版。这些著作都涉及中国小说的内容,但皆简率,鲁迅说“于小说仍不详”,即指此而言。但天缪生的《中国历史小说史论》、张静庐的《中国小说史大纲》、郭希汾的《中国小说史略》、庐隐的《中国小说史略》等却是早期除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外研究或介绍中国小说史的专论,与鲁迅一样,都为扭转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作出了贡献。

[2] 1925年9月北新书局再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合订本前有鲁迅写的“再版附识”,云:

此书印行之后,屡承相知发其谬误,俾得改定。而钝拙及谭正璧两先生未尝一面,亦皆贻书匡正,高情雅意,尤感于心。谭先生并以吴瞿安先生《顾曲麈谈》语见示云:“《幽闺记》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其说甚新,然以不知《麈谈》又本何书,故未据补。仍录于此,以供读者之参考云。

钝拙即寿洙邻(1873—1961),鲁迅少年时的塾师寿镜吾的次子。他曾以笔名“钝拙”给鲁迅写信,指出《中国小说史略·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中滦阳管辖之误。1925年7月8日,谭正璧也写信与鲁迅,介绍了吴瞿安(吴梅字)《顾曲麈谈》中有关施耐庵的材料。1930年北新书局重版《中国小说史略》时,鲁迅将吴梅的说法补入第十五篇,但认为“未可轻信”。

目 录

前言	/ 1
题记	/ 1
序言	/ 1
第一篇 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	/ 1
第二篇 神话与传说	/ 11
第三篇 《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	/ 23
第四篇 今所见汉人小说	/ 30
第五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	/ 40
第六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下)	/ 52
第七篇 《世说新语》与其前后	/ 61
第八篇 唐之传奇文(上)	/ 71
第九篇 唐之传奇文(下)	/ 83
第十篇 唐之传奇集及杂俎	/ 95
第十一篇 宋之志怪及传奇文	/ 106
第十二篇 宋之话本	/ 118
第十三篇 宋元之拟话本	/ 131
第十四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上)	/ 141
第十五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下)	/ 153
第十六篇 明之神魔小说(上)	/ 168
第十七篇 明之神魔小说(中)	/ 175
第十八篇 明之神魔小说(下)	/ 184
第十九篇 明之人情小说(上)	/ 194
第二十篇 明之人情小说(下)	/ 204